

女性觉醒的呼唤

——解读弗兰克·诺里斯的女性观及其小说的女性形象

曾 绛^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 外语系,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弗兰克·诺里斯对 19~20 世纪之交女性的生存状况、个体意识和社会角色进行了大量考证和深刻思索, 并通过小说创作, 将自己的女性观注入多部小说多个女主人公的塑造之中, 使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女性主义内涵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诺里斯所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家中天使、新女性和双性气质女性, 既体现了其女性观的嬗变过程, 又从一个侧面凸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关键词: 弗兰克·诺里斯;《章鱼》《深渊》《布利克斯》;女性主义

弗兰克·诺里斯(1870~1902)在短短 11 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不断探索, 从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走向批判现实主义, 被誉为“连接美国自然主义与法国自然主义重要纽带”、“美国艺术与思想转型的试金石”^{[1]5}“19 世纪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鼓吹手”^{[1]1}和“20 世纪初‘揭丑’文学运动的先驱”^{[2]223}。迄今为止, 国内外已有 200 多篇期刊论文和 50 多部专题著作从不同视角对诺里斯的作品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和现代化解读。诺里斯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成为众多评论家争相讨论的主题。

诺里斯塑造的女性形象总体上分为三类: 消极的传统女性为第一类。此类女性趋向于依附男性、对男性及男权社会具有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美国批评家 Donald Pizer 在其著作中将这类女性形象概称为“维多利亚女性”, 并指出: “在新女性觉醒并寻求自我实现的 19 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下, 诺里斯通过塑造一个个‘家中天使’形象, 重申了 19 世纪‘理想女性’的标准, 呼吁女性安于厅室。”^[3]新女性为第二类。有评论家指出: 处于创作成熟期的诺里斯对女性问题的处理比以往更为复杂, 更为深刻。厄内斯特·马查德认为: “他同情女性, 并了解女性”^{[1]109}。评论家埃比则指出: “诺里斯早期作品中不乏有主见, 有能力, 有坚毅性格等特征的新女性形象。”^{[1]88}第三类为“具双性气质”的女性形象, 即个体同时拥有男女两种性别性格的特征。本文以诺里

斯的《章鱼》(The Octopus)、《深渊》(The Pit)和《布利克斯》(Blk)三部长篇为文本, 并参考诺里斯传记、书信集和评论集, 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诺里斯在此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 同时揭示诺里斯女性观的发展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女性觉醒的社会意义。

一 三部小说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章鱼》中的女主人公安妮·台力克是“家中天使”女性形象的典型。安妮早年试图以自食其力而养活自己。然而, 她并未意识到这种尝试对女性作为独立个体而生存的重要性, 转而认为婚姻美满与否是鉴定女性社会身份的标签, 深信通过婚嫁而成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佳归宿。在此意识下, 她放弃了能使自己保持相对独立人格的职业, 成为一个依靠丈夫而生存的家庭主妇, 继而产生了离开丈夫就无法独立生存的恐惧感。独处时, 经常带着一种不安、疑惑、厌恶的神情凝视屋外的广袤农田, 夜中常因噩梦而惊醒。现实生活中, 她听任命运摆布, 一味地逃避社会现实, 试图永远蜷缩在家庭这个躯壳内。与丈夫谈话时, 她从不坚持什么, 丈夫对其怒吼, 总是迎以诧异的眼光, 无条件接受丈夫所强加于自己的要求, 处于沉默语的状态。

诺里斯在其评论集中谈及这部小说女性形象的塑造, 指出: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 “家中天使”所能学到的知识局限在“家政”范围, 所受家庭训导

① 收稿日期: 2008-12-03

作者简介: 曾 绛, 女, 湖南湘潭人, 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外语系助教, 文学硕士, 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多为如何使自身具备魅力以吸引异性,所要求具备的阅读能力是读懂各种道德训诫并按其中要旨规范自己的言行,她们唯一的社交活动是参加各种宴会,凭借年轻貌美博得异性的青睐,以使自己终能嫁给一位富有的男人,婚后则龟缩在封闭的居室中。^{[4]127}诺里斯进而评论道:“家中天使”的人生充满着悲剧色彩,而其人生悲剧则来自其自己对异性及男权社会的屈从。

诺里斯对此类女性持有双重态度:一方面同情这些遭受父权和夫权双重压迫的女性,另一方面对其依赖性和不抗争性表示愤慨。他指出:这类女性自愿被物化成客体,丧失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力而沦为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对象。^{[4]150}《章鱼》中另一女性安吉尔也是此类女性的代表。在小说中的男人眼中,“安吉尔金发碧眼,两条辫子垂在脸旁,浑身散发着玫瑰的芬芳,迷人的杏眼闪烁着紫罗兰光彩,两片丰润的嘴唇象康乃馨一般殷红,脖子如同百合花一般白洁秀美,发间散发出白荷花的芳香,丰满的臀部和浑圆的肩膀充满活力。”^{[4]623-624 709}这种女性美自然符合男权意识的审美标准,且恰与男性的阳刚之美对立统一。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审视的主体,女性则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和“审视的对象”,被摆放在“被凝视”、“被阅读”、“被欣赏”的平台。^[5]在《章鱼》中,安吉尔的妖娆纤巧、曲线丰满、白净纯然……囊括了来自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的综合美,以此被牢牢锁在充满男性霸权的美学牢笼中。安吉尔之美可被视为是男性将其综合美幻投射在被设计的女性形象上的一种表现。

诺里斯在《深渊》、《莱蒂号上的莫兰》、《麦克提格》等小说中塑造了劳拉、莫兰和屈丽娜等新女性形象。这三位女性个个目标明确,行事果敢,有着崇高理想并具广博知识。她们不愿再做传统规范的“客体”,不再沉默无语,不再矜持失音,不再为“他者”,而努力使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决策的主体。《深渊》中的女主人公劳拉是这类新女性的典型。

由于所受的教育与其他女性不同,劳拉的言行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特性。她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她不满新英格兰道德规范对女性言行的束缚,勇于打破桎梏,敢于与男权社会抗争,坚持个人的独立人格。当她意识到封闭落后的乡村已成为她实现人生目标的障碍时,毅然迁往适合她个性发展的都市居住。劳拉一度深深陶醉在追求者们“众星捧月”的感觉之中,然而,当她

意识到追求者不过是将她看成“欲望客体”这一现实时,她愤然提笔写下绝交信,并不再与其往来。虽被众多追求者爱慕,劳拉却对婚姻强烈反感。劳拉的婚姻偶成于她的一次错误决定。当劳拉意识到婚姻生活的原有想象被其丈夫的传统观念所肢解,她公然呼吁自己有如被禁锢在装饰精美的豪宅中,从未感到一丝的快慰。艺术家科特尔先生的出现给劳拉灰色的生活增添了异彩,她沉醉在科特尔激情澎湃的钢琴演奏中,在他美仑美奂的艺术品评论中畅想。劳拉显然是一位具有情爱自由意识、婚姻自主意识、夫妻平等意识、命运抗争意识和经济独立意识的女性。诺里斯通过对劳拉形象的塑造,揭示了新英格兰旧俗和封闭的室内生活对女性天赋和独立精神追求的束缚,强调新女性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应具有独立意识。

为缓解当时社会日益激烈的两性矛盾,诺里斯在《布利克斯》中创造了他最为欣赏的女性形象——双性气质女性。在《布利克斯》创作中,诺里斯塑造了一位不甘命运的摆布,拒绝将自己作为婚姻商品的女性——特拉维斯。这位女主人公试图与旧的观念决裂,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凭借坚定执着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争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特拉维斯拥有自主、自立、自强、坚毅和执着等传统定义下男性才具有的气质,也具备温柔体贴、耐心细致和无私奉献等女性独有的气质。这种同时具有两性气质的个体被文学家、文艺批评家定义为“双性同体”或“双性气质”。英文 androgyny 中译为“双性同体”,又译“雌雄同体”或“雌雄同体性”。在生物学上“雌雄同体”指同一生物体上既有成熟的雄性性器官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在动物体形构造及生理特征方面,“雌雄同体”表现为雄性和雌性的混合特征。在心理学上,“双性同体”指同一个体的人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如兼有强悍与温柔、果敢与细腻等双性别特征。而在社会关系处理中,这一概念指个体按外部环境需要而作出不同性别特征的反应。在小说创作中,“双性气质”则指称一种文艺创作心态和美学风格。经著名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概念化后,“双性气质”的理解侧重于心理学层面。埃莱娜·西苏曾在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双性’即一个个体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或女个人,其两性特征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6]

二 女性意识觉醒的社会意义

19~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精神失落感和怀疑主义日益蔓延,达尔文主义被引入美国思想领域。“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扩大了自然主义在美国小说创作中的影响。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生存竞争”诠释了社会矛盾冲突,自然主义小说家以自然主义理论作为理解和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依据,注重表现本能欲望对人的行为的驱使并支配人的命运;遗传基因和自然环境决定人的个体特性和行为方式,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往往归于进化程度的高低,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大小。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小说家,诺里斯有着自己明确的创作主张,他强调:小说家不能只想自己或只为自己着想,应该研究人性。他还认为:最优秀的小说应包容各种自然力量、社会倾向和人的欲望。诺里斯在小说女性形象塑造中既保持着自然主义倾向,又力图体现人的自然属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还借助各种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因性别差异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冲突进行批判。

诺里斯通过《章鱼》“家中天使”的塑造,对父权社会的两性性别角色规范进行了无情批判,对父权社会刻意强调的两性差异——范畴化的“男性气质”(坚定的信念、勇气、力量、理性、独立性、竞争性和智慧等)和“女性气质”(软弱、温顺、依赖和被动等)给社会及社会进步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深刻揭露。诺里斯认为:处于父权意识下的女性若要被社会容纳和认可,她们就必须按照男性的意识规范,压抑、扭曲和重塑自我,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融入男性权力话语系统而符合父权意识。^{[4]53}这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的‘他者’,是可以被任意命名的物体。”^[7]通过《章鱼》“家中天使”的塑造,诺里斯反映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压抑、受迫害的种种场景,并利用所造场景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男女平等思想。

从《深渊》女主人公劳拉身上,读者可以看到“新女性”所具有的个性特质(坚定、智慧、理性、独立)。评论家劳伦斯·霍斯曼对劳拉的塑造给予高度评价:“劳拉是诺里斯所塑造的理想女性的又一关键人物。”^[8]劳拉现象表达了新女性对男性的不屈从态度,反映了“婚姻之于女性不再是最佳归宿,而是一种社会倒退的女性行为。”^[9]诺里斯在塑造

追求个性独立而为理想拼搏的女性时,表现出极为欣赏的态度,并“包容了这类女性在婚姻中寻求灵魂伴侣未果而产生婚外恋情的行为”。^[10]

作为男性,诺里斯无法摆脱父权制对其道德观的影响和束缚,对新女性的性意识觉醒以及性欲望膨胀等忧心忡忡。通过《深渊》中另一女主人公——佩琦的嘴,诺里斯表达了他对有着婚外情的劳拉抱有的一种焦虑。诺里斯认为:由于新女性试图摆脱传统女性观对自己的束缚,而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随之变革,一般男性一时难以跟随时代进步而转变观念。在这种社会现实中,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不愿仅作为男性的伴侣,她们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加剧两性矛盾。诺里斯就此指出:女性走向男性化并不是解决女性问题的最终出路。^{[4]137}

具有“双性气质”的女性是诺里斯后期创作中所着力描写的理想女性形象。他所塑造的特拉维斯对于男主人公康迪·莱维斯来说,不仅是一位帮助他克服恶习的训导师,更是他的心灵伴侣。诺里斯描写的两性婚姻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两性心灵的碰撞和灵肉的结合。诺里斯对“双性气质”女性的塑造体现了男女两性共同的人性层面,从而模糊传统的性别界限,从观念上使女性成为与男性一样的平等的“人”,缓解了现实社会中的两性冲突。这类女性形象既颠覆了父权社会对女性作为“客体”、“他者”和“第二性”的规范,也摆脱了男权中心文学塑造出的逆来顺受的“家中天使”形象以及一些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的束缚。纵观女性主义研究,诺里斯所塑造的“双性气质”女性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雌雄同体”女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两性平等互补的主张也与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社会性别观不谋而合。

作为男性作家,诺里斯能够站在女性立场关注女性命运,体会女性的生存经历,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尖锐批判男性意识对女性意识的禁锢和摧残,将女性应担任的社会角色作为其创作的重大主题,并贯穿其终身创作。从缓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性紧张关系和性别混乱的社会现实出发而塑造的双性气质女性及进而提出的两性平等互补模式来看,诺里斯在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观无疑具有超越性别、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阅读诺里斯的作品,我们可解读出女性意识觉醒对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下转第85页)

世界的不完美体现。象征的方式是比喻的方式,其此物与他物的联系是概念的联系,其联系则有先验性,神秘性,也就是用理性的方式达到超验的目的。》^[8]¹⁵⁶也就是说象征物象往往是作为生命和人生的隐喻而存在的,一方面象征物象具有预设性,先期暗示出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冥冥中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作者正是运用这些空间场景的象征意蕴以及其原型意象的再现,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从而把主人公无法言传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体验表达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看到美国男权社会中妇女心底的彷徨、困惑和挣扎,及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与追求。同时我们又看到,在肖邦所处的时代,任何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表露都会遭到压抑和扼杀。所以当马拉德夫人的自我意识刚一萌发,试图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时,只能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她的自由幻想在男权社会的重重禁锢之下终归破灭。

参考文献:

- [1] 凯特·肖邦. 一小时的故事 [J]. 金莉, 秦亚青, 译. 外国文学, 1995(4): 53-54
- [2] 邱运华.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0-91.
- [3] 刘婷. 《一小时的故事》艺术特征探析 [J].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2007(1): 48-51.
- [4] 杜荣芳. 明晰与复杂的高度统一——试析《一小时的故事》的空间叙事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07(3): 71-74.
- [5] 陈达凯. 圣经典故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6]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 [M]. 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192
- [7] 艾青. 诗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99.
- [8] 邓程. 论新诗的出路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56

(责任编辑: 卫 华)

(上接第 78 页)

参考文献:

- [1] French, Warren. *Frank Norris*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62
- [2] Marchand, Ernest. *Frank Norris: A Study* [M]. Stanford: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1942 /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 [3] Pizer, Donald. *Evolutionary Ethical Dualism in Frank Norris's Vandover and The Brute and McTeague* [J]. *PMLA*, 76 (1961): 178
- [4] Norris, Frank. *Frank Norris: Novels & Essays* [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6
- [5] Graham, Donald. *Critical Essays on Frank Norris* [M]. Boston: G. K. Hall & Co., 1980: 47
- [6] Wahol, Robyn R., and Daniel Prince Hend. *Feminism: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M].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4

- [7] 西蒙·德·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9.
- [8] Phipps, Karsten H. *Love & Labor Regained: The Making of Companionate Marriages in Frank Norris's The Pit* [J].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0 (2004): 28-56
- [9] 贝蒂·弗里丹. 女性的奥秘 [M]. 邵文实, 等, 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9: 68
- [10] McElrath, Joseph R. Jr. Jesse S. Crisler. *Frank Norris: A Life*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6: 43-44.

(责任编辑: 卫 华)